

上卷

魏斐德 著

[美] Frederic E. Wakeman Jr.

# 讲述中国历史

梁禾 主编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东方出版社

上卷 |

魏斐德文集

[美] Frederic E. Wakeman Jr. 著

# 讲述中国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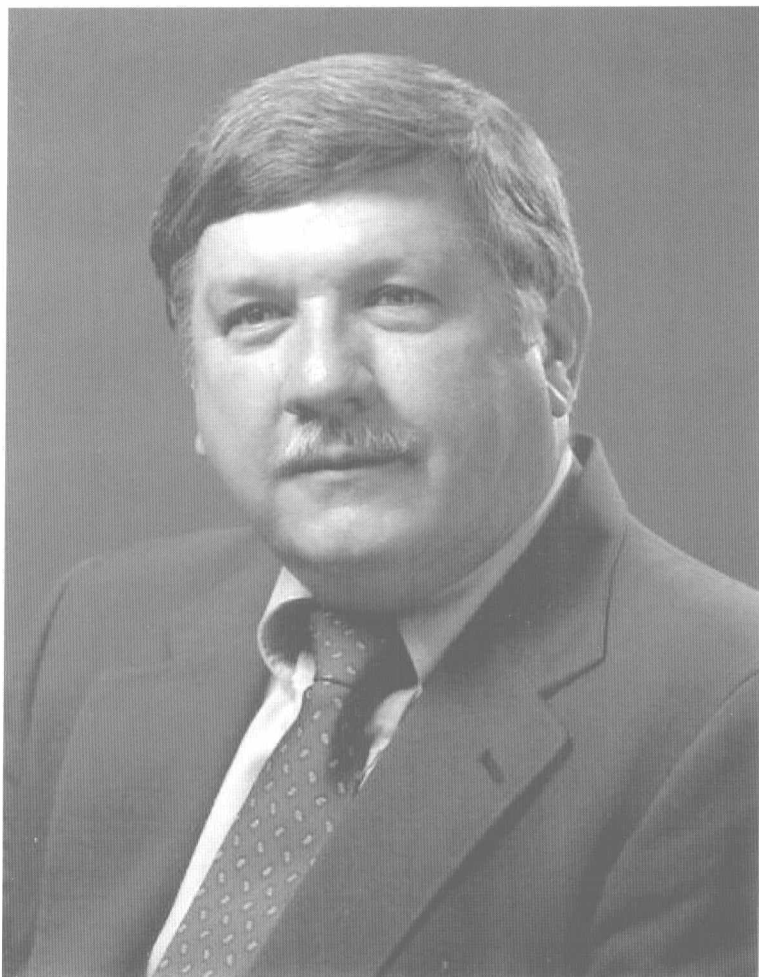
梁禾 主编



TELLING  
CHINESE  
HISTORY



東方出版社



[美]魏斐德博士 (Frederic E. Wakeman Jr. 1937~2006)

本文集的出版得到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大力支持与协助

## 前 言

这部文集的价值不言自明。它的诞生，是世界各地学者、翻译人才、出版等各界人士共同艰苦卓绝努力的成果。

治学为人，先生均被视为楷模。多有学人屡用大写的“人”来概括先生的一生。在治学上，先生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他对中国历史的兴趣与投入，激情洋溢且经久不衰。我曾问他：“你一生致力中国历史研究，要是真有来世，那时你会选什么事业？”他想了想，说：“中国历史。”“还是中国历史，没见过你这样要迷两辈子中国历史的！”他憨厚地笑了笑，点点头，然后用中文敦厚地说：“对，我太喜欢中国历史了。在我眼里，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我庆幸自己有这份缘。”

先生 28 岁开始在加州伯克莱大学当教授，这以后的 40 年里，除了教学和指导研究生，他还担任了一系列美国全国性学术机构及中美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领导工作，然而他的著述仍然那么丰富多产。有学界朋友问：“魏教授发表这么多著作，带这么多研究生，还教课，担任学界领导，他是怎么过来的？”其实，奥秘就在于：从不搞权术，不花时间拉织关系网，还有就是减少睡眠。2006 年 9 月 14 日，先生因患癌症病故，举世学人好友惊愕悲痛，各地的悼念活动与纷纷的回忆文章感人至深。各代学者中都有人说：“若无魏教授，岂有我今天！”

作为一个学者，其学术成果乃为其一生的最终见证。先生除了出版的专著以外，还有更多的论著见于各种学术杂志上，这部分中文译本，相对不多。鉴于此，编辑林敏女士立刻提出出版先生文集中文版的计划，她为此缜密构思，并不辞辛劳地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不久美国学界也决定同时

出版《讲述中国历史》英文版文集。著名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S. N. Eisenstadt）先生，不顾80多岁的高龄和耶路撒冷夏日的高温，为给文集写总序，刻不容缓地开始阅读我快递过去的整整一箱子先生40年来的著述。而那一箱子影印件，以及各位翻译手中的原版文章，都是伯克莱东亚图书馆专业人员何剑叶、吴一丰、薛燕等在暑假里突击赶制出来的。她们一篇篇地将先生40年所有论文复制出来，及时寄送到我手里供选用。不仅如此，在以后的日子里，每逢翻译们遇到摘引原文的困难时，我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回头找她们——她们在核对史料与查找资料上，拥有世界第一流的能力与效率。

若说先生的论著覆盖了近千年的中国历史，他的论文题目则更为浩瀚广博，其中除历史外，有中西方研究法比较、理论概念的论证、学术现况与趋势的剖析等，所援引的史料和参考资料则更惊人：光从这些资料所用的语言就有中文、英文、法文、德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日文、西班牙语、希伯来语，等等。翻译工程因此而史无前例地复杂艰难。于是我向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熊月之先生求援，让他出一支专业人马承担翻译。熊月之先生立刻答应。加上英语世家出身的北大西语系教授张世耘、旅居奥地利的项佳谷女士、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徐有威、上海师大的博士生齐克彬等，一支精良的文集翻译队伍组成了。在熊月之先生的领导下上海社科院历史所承担了文集最重要部分的翻译。其中《史林》主编、历史所周武教授在统筹、组织分配、指导翻译等方面持续近一年之久，尤为辛劳。此外，无数学者向我提供了各种宝贵帮助，其中有曾佩琳（Paola Zamperini）教授、郭启涛教授、蓝梦林（Patricia Thornton）教授，还有民营出版家严博非等。我对他们的敬意与感激，语言难以充分表达。然而，我亦深知，他们如此敬献，并非仅因对我本人友善所致，更是出于他们对先生的敬仰，对历史的责任，对学术研究的使命感。

此文集选入的文章出版跨度达40年之久，这40年对于中国，是一个世上少有的天翻地覆社会巨变的历史过程。在中国历史研究上，仅从关闭到逐渐开放档案文献这一点，其变化就非常惊人。先生著述的前部分，是在中国未向外开放，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外国人很少能接触到档案史料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到了后期，情况则大有改善。所以，先生40年著述本身，也是海外中国史学的一个缩影。在专家学者的建议下，文集的每个章

节都由一名本领域的专家介绍学术背景、主题含义、作者研究思路等，为读者提供分析理解的框架与基础。这些专家多数都是中国读者熟悉的，他们本人学术成就显著，且大都熟知先生的毕生研究，其中周锡瑞教授（Joseph W. Esherick）与曾小萍教授（Madeleine Zelin）是先生多年前的学生。他们对文集的贡献，是先生学术精神遗产后继有人，得以发扬光大的见证。

作为文集主编，我在编撰过程中也发现了一系列暂时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如国内学术界对学术论文的注释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在处理史料和参考文献出处上也是如此，等等。还有，学术论述的关键之一，是求实与实证，然而因中美两国的不同社会政体，加上篇幅所限，本文集不得不对一些论述与结论做删节。对此，谨希望读者们谅解。附录书评部分除了对史学所作的评论外，还包括对有关中国的小说、回忆录、传记等的评论，为读者了解美国社会、逐渐接近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先生毕生从善如流，对人事豁达，而且这些作者先生大都认识，但他更以对读者的责任心为重，所以力求公正，不苟私情。考虑到国内学术文化界尚未建立成熟的专业评论这一情况，希望“书评”这一部分能成为一个借鉴。

总之，出版《讲述中国历史》文集的中英文版及过程，是无数宏亮之心奉献的结果，也无疑是先生为人的见证。当出版文集的计划还在雏形之中，北大的刘东教授就为我赠送了几篇已经翻译好的译稿，并积极为文集出谋划策。他对先生的敬意与友情，说来话长，又是一番动人故事。

最后，求学求知，除了增加人征服世界的力量，使我们在全球化生存中更具有竞争力外，更重要的应该是：完善我们的人性。再现历史，使我们变得聪慧；凝视往事，使我们避免重蹈覆辙，从而使人之行为保持文明，世界充满光明。这便是先生研究历史的宗旨，亦是文集问世的意义所在。

梁禾

于美国俄勒冈傲思维古湖畔

2008年5月

序 言

---

# 从世界及比较史的 视角读魏斐德文集





## 序言

---

艾森斯塔特 (Shmuel N. Eisenstadt) \*

魏斐德的《讲述中国历史》是一部非同凡响的文集。它的独特之处体现在其包含的广博命题及研究方法中。其论文研究覆盖了不同地区、组织及机构进行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微观分析，以及广阔的比较背景下研究意识形态和宏观社会分析。

或许这部文集最突出的特点是各种分析全都被共同的学术远见和分析理路连接一体，这些在魏斐德的主要著作中也有所表现，它们为分析中国历史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做出了重要而显著的贡献。

在中国研究领域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魏斐德实证性地指出了该领域存

---

\* 艾森斯塔特 (Shmuel N. Eisenstadt)，世界最著名的社会学家之一。1947年在耶路撒冷获博士学位。退休前为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的社会学若斯·易萨克讲座教授。多年来在全世界各高级学术机构任客座教授（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学院、苏黎世、维也纳及香港等大学），也是世界诸高级学术机构和组织的成员，并被世界诸多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其学术成果与著述屡获世界各国社会学大奖，其中包括：巴尔赞国际奖 (International Balzan)、阿马非社会学和社科奖 (Amalfi Prize for Sociology and Social Sciences)、霍尔堡国际纪念奖 (The Holberg International Memorial Prize)。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的著作有：《帝国的政治制度》(The Political Systems of Empires. 1963)、《以色列社会》(Israeli Society. 1967)、《革命和社会演变》(Revolu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eties. 1978)、《民主的矛盾性、脆弱、持续与变化》(Paradoxes of Democracy, Fragility, Continuity and Change. 1999)、《现代与现代化》(Modernity and Modernization. 2004)等。

在的误解与盲点。通过分析关键问题、潮流与事件，他远远地超越了前人的学术成就，将中国史学研究引领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比较史学与世界史学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二

了解魏斐德的见地与理路的良好开端，是他关于17世纪危机与中国关联和影响的研究。这场危机在现代欧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一直是现代史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很多在欧洲之内研究的比较议题的焦点。魏斐德以一种原创而又缜密的方法考察了这场危机对中国的影响，聚焦于似乎相互矛盾的事实：危机在欧洲带来了影响深远的政治与经济转型，并将其引向了现代化；而在中国，明、清两代帝国却在现存体制内，利用制度性的控制和财政政策，成功地克服了这场危机所带来的问题。

诚然，这并非意味着明、清帝国内部没有发生在制度、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重要变化。魏斐德研究了这些发展变化，尤其是地区性层面的发展。紧接着，他分析了成为“早期现代”特征的帝国疆域的重大变化。而与绝大多数欧洲社会不同，这些变化被纳入明、清帝国中央制度框架的一部分。

在这一背景下尤为重要的事实是，明、清政府不仅可以控制各种内部发展，而且，在很多方面，他们也可以控制波及到中国的更广泛的国际环境。正是在冉冉兴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影响之下，这些环境急剧变化发展。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正是这些确保了帝国体系延续的至关重要的制度和政策，最终却导致了其帝国的灭亡。魏斐德的分析指向了一个在比较社会—历史研究中即世界史研究中最迷人的问题，即制度模式与其大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之间的关系。制度对一个环境的适应性，很可能在另一个环境里，这种适应性就是障碍。这个问题并非局限在中国，比如，对于分析西班牙帝国或威尼斯的衰败也是至关重要的，但却没人能够像魏斐德分析明、清中国那样清晰地呈现给大家。

魏斐德所做分析的卓越贡献存在于这样的事实，那就是，他没有用中国精神的本质主义来阐释看似独特的中国经验。而是，在分析社会秩序所

包含的种种具体方面的基础上，用明清朝代的特殊经历，来透析中国社会。

魏斐德分析了以儒—法家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社会面貌及其制度属性，包括代表这种意识形态的具体团体或载体，他还分析了在中国发展成形的帝国霸权。

关于超凡与世俗秩序之间的对立关系——轴心演变论的意识形态核心，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观念，是相对世俗的形而上学或伦理的，而非宗教式的。这种对立性的“世俗”定义，使世界得以被一种非常具体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秩序构建起来，这种秩序也成为维持宇宙和谐的主要方式。它专注于苦心经营所谓教化，也就是赫伯特·芬格莱特（Herbert Fin-garette）对“神圣化的世俗”以及对“神圣仪式化的人类共同体”的定义。儒—法家之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政坛，被视为努力维持宇宙和谐的中心。

由此，中国发展出了一种对礼仪或礼仪与神圣混合体的强烈注重，将其作为社会—政治秩序合法化的中心标准，并倾向于以神圣与合法相混合的术语来表达这样的礼仪，其中还稍掺入一些皇权因素。与其他轴心时代的文明不同，在中国，这种纯粹神圣的合法性所含的对立性相对较弱，被分散到次要区域，而这些区域也都是从中心分离出去的。

这种合法性模式在中国社会与文明的一些基本制度性框架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大法领域中，政治斗争以及法律体系便体现了这种模式。

其次，中国发展出一种存在于中央与主要边缘区域、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次级”宗教，尤其是道教和佛教，与许多地方性崇拜与秘密社会之间具有很特别的连带关系，魏斐德曾全面分析了这种关联。这种关联的特点是中央试图重新建构后者，尤其是它们与中央的关系。在给予它们相对较大的“地方”自治的同时，对它们的潜力与进入中央的能力加以控制。

### 三

这些关联的模式也诠释了中华帝国制度的重大变化过程。与魏特夫式

“东方专制主义”及诸多“东方主义者”有关中国历史的概念相反，中国在所有制度层次中，的确经历过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变化。这不仅仅包括朝代更迭与帝国区划，还指经济结构的深远发展。这些变化发生在城镇与乡间，在不同的文化与社会团体的存续方面，以及皇帝（比如明朝）对官僚体制的相对压制方面。

但是，与其他轴心时代文明，特别是与那些神教文明相比较，这些变化进程和运动仅产生了相对有限的制度性影响。在帝制时代，所有这些运动与过程并未能削弱以儒—法家文明为基础的政治秩序和基本意识形态体系。中华帝国时代出现过许多新的意识形态，但它们通常仅提供对主流价值结构的从属性阐释——即使12~13世纪具有突破性的新儒学，亦如此。这些运动绝大多数接受了天命这样的意识形态和象征，尊重统治者的责任以及中央所组建的威望体系，并未从本质上滋生出新的导向或全新的制度模式。无独有偶，藩王或军阀的政治倾向通常也建立在现存意识形态框架与政治框架之内。他们同中央政府争斗，以向中央争取更大的独立，或从中央掠夺更多，却很少立志建立一种新型的政治体系。仅随着王朝的衰落，“真正”羽毛丰满的军阀主义才发展成政治架构中的主要力量。同样，出现在乡间尤其在市井的生机勃勃的经济发展，并未在总体上削弱那个控制、划分着初端市场经济影响和各种势力的政治经济模式。

#### 四

魏斐德对发生在中国的变化进程所作分析的卓越贡献建立在前人学术成就之上，但远远地超越了它们。他的研究结合了城市的活力、乡村的背景还有秘密社会等，在当代中国研究领域为一些最重要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在强调这些变化的活力及其在新的相对自治的空间的重要性之同时，魏斐德的研究让我们对统治者采用的截然不同的控制方式有了极为清晰的了解。这些方式诠释了为什么与轴心时代的其他文明相反，中国的那些变化没能带来更深刻的制度性转型。

魏斐德的分析清楚地表明，中国社会控制机制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各

中心城市之间、各派别、秘密社会及其各领导层之间，在思想上和结构上的薄弱关联，这种薄弱关联也体现在各精英团体之间。

为数众多的反抗运动，发展中的社会团体与经济领域各部门，还有生长于社会边缘或从属制度性范围中的宗教运动，都很少与中央政治斗争有联系，从而难以通过集中的政治行动来发展共同的意识形态或政治框架。

同样，佛教与道教这类“次要”宗教与中央政治斗争的关系，也没有对中国社会及政治秩序施加深刻的、可以起改造作用的影响（除了唐初的灭佛运动），尽管它们对体制的重要变化产生过影响。

## 五

为了理解这些控制方式的相对效力，分析单一文化倾向的主要载体的基本特征——文人与官僚——便至关重要。魏斐德有很多文章将他们的显著特征与其他轴心或帝国社会的同类做了比较。

魏斐德的分析在早先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扬光大。他阐释了这些单一性团体在建制上巨大的自相矛盾。一方面，这些文人与官僚是儒（或儒一法）家天地秩序及导向的主要载体。于是，相对更广泛的社会各阶层和政治中心来讲，尤其在象征意义上，他们比较自治。他们被任用，根据儒一法标准得到合法地位并被组织起来，因此而不受社会其他阶层左右，在原则上甚至亦不受皇帝本人的控制。

但另一方面这些文人并不仅仅是起思想知识或自由流体作用的饱学之士。或许作为官僚体制惟一最重要的录用人源，他们至少部分地起着垄断通向中央途径的作用。他们围绕在皇帝及其左右的周围，有时也围绕在大军阀——统治结盟的主要成员的周围，几乎将其他团体或社会元素完全排除在外。

于是，中华帝国大概是仅有的一种轴心文明，其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确实属于高级团体）是这些文明基本框架的中心和半垄断团体，使中华帝国体系成为葛兰西式专一制的最好例证。但是，这种专一制同时又具有一些明显的、自相矛盾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文化精英的活动与政治精英的活动之间的区别不那么明显，并缺乏自治的组织基础。他们的结

构框架与那个任用了 10% ~ 20% 文人总数的国家官僚制度的结构框架是一致的。除了一些学派或书院以外，他们没有自己的广泛组织，也没有自治的权力与资源基础。仅在一个领域范畴内，即教育领域，他们确实发展了一些自治组织与结构。然而，即使在这一领域，这些活动具体的特定作用也常常与政治—行政背景密切结合，并以之为导向，而与次级精英及处于权利范畴边缘的领袖人物们的活动相应地存在隔离。

葛兰西式式的专一性特点得以在中国盛行，解释了：与其他帝国体系相比，为什么这个官僚体制从数量看，其范围是最小的。

中华帝国的这些专一制因素诠释了，当 17 世纪国际性“世界”环境都继续处于危机的时候，它为何具有控制此危机的能力。这些因素也解释了当危机性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它出现的弱点。

## 六

正如魏斐德的分析所显示的那样，中华文明产生出一种在知识分子、“世俗”以及诸如宗教之间的明显的关系模式，该模式对体制的功能有着决定性影响。

魏斐德的卓越贡献还体现在他比较性的研究中，这些研究记录在他分析中国儒家体制的一系列杰作之中。

魏斐德另外一个系列的著作专注于研究中华帝国知识分子的困境，研究他们在社会体制下为精神独立付出的代价，以及他们形成精神独立的各种方式。

后来，当魏斐德分析中国的民间社会时，这个问题再次浮现。与杜维明这样的当代新儒家相反，关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维系，他指出的是独立个体意识的薄弱（若不是完全没有的话），及与之相伴的儒家意识形态中公民意识的薄弱。

## 七

正是这一社会与意识形态力量的特殊分布——我们可以在所有轴心文明中看到，但体现方式却各不相同——解释了意识形态在中华文明的基本构建与运作中的重要位置。在为芮沃寿（Arthur Wright）有关隋代的著作所作的书评中，魏斐德首次强调了意识形态的这种特殊地位。他向我们指出，如果置意识形态的深刻意义于不顾，将无法圆满地诠释隋朝制度的成功。魏斐德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在明、清帝国这一现代早期以及现代中国的战乱时期，这种专一式意识形态的影响及其载体。

## 八

魏斐德的研究一方面涉及了中国社会很多领域中影响深远的变化与发展，另一方面涉及了这些变化改变了中华帝国社会制度性形式的独特方式，阐述了这个社会的活力，以及与其他轴心文明或帝国社会的差异。

撇开东方主义者的争辩，这些研究使他更靠近韦伯式的对一种特殊文明类型的活力的分析。韦伯的《宗教与社会》并未关注于对古埃及或亚述文明，或各种南亚文明甚至日本文明的分析。尽管韦伯常常在自己的权力结构和经济构造分析中涉及到它们，但它们的宗教或文明取向却并没有成为韦伯研究的固有成分。

与对韦伯的一些解读，还有后来的东方主义方法，以及与马克思分析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很多方法相反，韦伯并不认为他所研究的“非西方”文明——古犹太教，中国和印度——是停滞甚至退化的，是与西方世界的活力相对抗的。阿尔弗雷德·韦伯，尤其是他的同事雅斯贝尔斯，会宣称轴心文明通过新教向现代化发展，向总体上属于新型的理性发展，它包含生命的所有范畴，产生着自身的对立与矛盾。韦伯分析这些文明的活力——与西方分离的活力。他并不认定大多数非西方的文明缺乏弹性，纯属神奇，非理性，他认为在这些文明内部发展出它们自己特定的弹性与理性，

主要是 Wert and Zweckrationalität [价值理性与目的理性] 不同类型理性的结合，而产生出不同体制的活力模式。正是这种不同的具有其自身对立的理性方式，导致了关于“救赎”的不同概念。韦伯认为，在这些文明中施行的主要超凡性概念，此概念至少是这些力量的一种原动力。韦伯分析：异端邪说，却总是与不同的经济和政治团体相关联，而它们间的碰撞，亦存在于这些力量的最重要的载体当中。

魏斐德的著作是最优秀，也许是惟一的，关于中国社会力量的韦伯式分析明证，应该成为对所有重要文明进行比较分析的模型。同时，魏斐德超越了韦伯的研究，他的研究还涉及到了现代中国的动荡。

## 九

高屋建瓴与重要且具体而详细分析的独到结合，也是魏斐德对现代中国以及中国现代性骚动之研究的最显著的贡献。

从《大门口的陌生人》到《历史与意志》的毛泽东时代及后毛泽东时代之中国，魏斐德的实证分析，及早先他的导师列文森（Joe Levenson），还有舒曼（Frank Schurman）等著作，以不同方法，代表了当代世界（尤其是美国）解释中国现代化的重要努力。魏斐德考察了他们论述方法带来的问题，以及他们由于意识形态倾向所具有的局限，并指出分析中国现代性的要点。

其中一个问题涉及到帝国崩溃之后，在现代中国建立持续的切实可行的现代秩序的困难性。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中国是惟一个从未被直接殖民化的完全独立的亚洲帝国。尽管曾经被西方列强侵吞，并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挑战，但原则上中国却从未丧失其独立。维持独立的努力与中华帝国在世界所处的方位为其现代做出了持续的贡献。拿这种历史现实产生的结果与亚洲其他社会进行比较，应该也是比较研究的重要专题，而魏斐德的专著与论文对这一时期的精彩分析，恰恰为这一研究打下了基础。

但是，或许现代中国的中心问题是它面对现代的独特方式，其特点是在意识形态与制度层面之间摇摆。它一方面在“简单地”模仿西方或苏联模式，另一方面试图塑造鲜明的中国特色。当然，这一问题并不局限于中



国，但它却因其特有的文明“遗产”而在中国发生影响。

魏斐德还有另一个显而易见的分析中国现代的强项。与那些采用本质主义，因而必然是专一主义观的学者们相反，他一直强调具有各种文化与制度的现代化途径。魏斐德不仅论述处于“意识形态”中心的社会模式，也坚持更“实际的”具有开放潜力或者多元的现代之远景——上海便是一范例。

魏斐德将中国研究推向新的领域和方向，提供了分析中国在世界之位置的更为复杂的方法。如果可以给他更长的创作生命，他一定会继续这样走下去。现在，他的著作不仅是一位伟大学者的纪念碑，也成为一代又一代学者的楷模与挑战。

徐有威 李嘉冬 译